

资源拼凑视角下价值共生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机制

——以成都市W区H社区为例

吴文冰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1日

摘要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资源匮乏的老旧社区面临治理需求激增与内生供给能力不足的尖锐矛盾。文章基于资源拼凑视角, 通过对成都市W区H社区的深度案例研究, 探索社区突破资源约束、实现多元价值共生的创新路径。研究发现, H社区在资源约束、政策支持、需求差异与企业战略四重前因条件的交织驱动下, 通过成立社区社会企业这一关键行动, 对人力、市场、制度、文化、空间五类零散、闲置或未被识别的资源进行创造性拼凑与重构。这一拼凑过程催生了“社会企业+社区基金+多元共治”的可持续治理模式, 其拼凑结果超越了单一的经济或社会目标, 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重价值的融合与共生。最终, 价值共生机制反向巩固并拓展了资源拼凑的成效, 建构起一个富有韧性、充满活力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不仅为资源拼凑理论在非商业的公共治理领域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也为我国基层社区, 特别是资源紧缺型社区, 破解治理困境、实现内生性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和理论启示。

关键词

资源拼凑, 价值共生, 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会企业, 基层治理现代化

The Mechanism by Which Value Symbiosis Driv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Bricolage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H in W District, Chengdu

Wenbing Wu

Abstract

Amidst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resource-scarce aging communities confront a critical dissonance between escalating governance demands and deficient endogenous capacity. Drawing on resource bricolage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Community H in Chengdu to elucidate pathways for transcend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achieving value symbiosi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nder the confluence of resource scarcity, policy support, heterogeneous needs,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 facilitated the creative bricolage of fragmented human, market,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spatial resources. This process engendered a sustainable model—“social enterprise + community fund +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that transcends singular objectives to realize the symbiosi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Reciprocally, this value symbiosis reinforces bricolage outcomes, fostering a resilient governance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extends resource bricolage theory into public governance and offers a replicable paradigm for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esource-constrained communities.

Keywords

Resource Bricolage, Value Symbiosis,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然而，在实践层面，尤其是城市中的老旧社区，普遍陷入“低治理权”与高治理需求的结构困境。这些社区往往面临物理空间老化、公共财政投入有限、专业服务人才短缺、居民参与意愿淡漠、社会资本稀薄等多重资源约束，传统的行政主导或简单的服务外包模式难以有效回应居民多元化、精细化、持续性的需求，导致治理效能低下，居民获得感不强。

如何破解资源有限性与治理复杂性之间的矛盾？现有研究多从资源输入、结构优化或技术赋能等外部视角寻求解决方案，相对忽视了社区作为能动主体，对内生性、碎片化资源的创造性利用能力。近年来，发轫于创业学领域的资源拼凑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该理论认为，行动者并非被动受制于资源稀缺，而是能够通过“将就”、“即兴”与“重构”等方式，对手头现有的、看似无用的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以解决新问题或抓住新机遇。这一视角将关注点从“资源占有”转向“资源行动”，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于解释资源匮乏情境下的创新行为具有强大生命力。

本文将资源拼凑理论引入社区治理领域，以成都市 W 区 H 社区这一典型老旧社区为案例，旨在探究一个核心问题：在资源强约束条件下，社区如何通过资源拼凑行动，构建一个能够实现多元价值共生的治理共同体，并形成可持续的有效机制？通过对 H 社区“社会企业 + 社区基金 + 多元共治”创新实践

的剖析，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资源拼凑理论的应用边界，更能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一个扎根中国实践、富有解释力的实践示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社区治理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挑战

通过文献梳理可见，当前学界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围绕“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两类视角展开，并呈现出逐步深化的演进脉络。

在“何以可能”的理论探讨中，早期研究聚焦概念界定：有学者将社会治理共同体界定为多元主体基于协商与权责对等原则的合作群体[1]，也有视其为依托地缘与利益的共治有机体[2]。2020年起，研究趋于系统化，既有对共同体核心特质，如立体组织网络、公共精神与合作社会的提炼[3]，也有对其生成逻辑从理论与历史统一性角度的阐释[4]。此后，视角进一步拓展：2021年有研究从利益、情感与文化联结互动解析其内在机理[5]；有聚焦责任维度，解构责任共同体的运行逻辑[6]。

在“如何可能”的实践路径方面，已有学者探讨党建引领的类型与优化路径[7]。或主张通过培育公共性推动缔造型积极治理[8]；或提出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阶路径[9]；亦有从社区营造出发，分析空间再造如何支撑共同体生成[10]。也有基于现象社会学“视域构成”视角，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持续发展[11]，探讨构建路径差异，存在主体吸纳型、资源撬动型、居民凝聚型三类路径[12]。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从概念澄清起步，逐步深入机制解析，并延伸至制度、情感、空间等多维实践创新，展现出从理论奠基到路径细化的系统性发展，为理解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与可持续建构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学术支撑。既有研究多从外部资源输入、制度结构优化及主体协同关系等传统视角展开分析，对资源约束背景下老旧社区如何依托内生资源激活、临时性资源整合与实用性资源调配来推动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理，仍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为此，本文引入资源拼凑理论，探讨在资源强约束条件下，社区如何通过资源拼凑行动，构建一个能够实现多元价值共生的治理共同体，并形成可持续的有效机制？

2.2. 资源拼凑理论：突破约束的能动性视角

在深化对“资源拼凑”理论的理解时，必须将其置于公共管理既有的概念谱系中进行辨析，以明确其独特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Baker 与 Nelson 将其引入管理学领域，定义为“利用现有资源即时行动以开发新机会或应对挑战的过程”[13]。该理论认为，行动者并不依赖理想化的外部资源输入，而是积极识别并激活那些常被忽视、零散分布、闲置甚至被视为废弃的既有资源，将其转化为可用资产，从而提升治理效能。而治理效能不仅依赖外部资源输入，更受制于资源整合能力与内部协同机制[14]。与强调战略性规划与外部获取的“资源整合”，以及侧重结构性安排与稳定互动的“网络协同”相比，资源拼凑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资源动员逻辑。资源整合通常预设了清晰的治理目标与理想的资源图谱，其过程侧重于依据既定规划对外部资源进行系统性搜寻与配置，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适配[15]。网络协同则着重于构建多元主体间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与稳定的互动结构[16]。相比之下，资源拼凑的出发点并非理想化的资源蓝图或预设的合作网络，而是行动者所处的、充满约束的即时情境与“手边既有”的资源集合。它不追求资源的“完备性”与结构的“正式性”，而是致力于在有限条件下，通过能动性的创造，将那些零散、闲置的资源进行重组与转化[17]。因此，资源拼凑构成了一种在正式资源供给体系之外，激活内生性潜力、弥补治理缝隙的关键性实践机制。

进一步地，在公共管理与社区治理这一非营利性、强公共价值的语境下，资源拼凑的核心特质：“即兴”与“将就”，被赋予了特定的积极意涵。“即兴”并非意味着缺乏章法，而是指基层治理主体在面对

非预期性任务或突发性需求时，能够突破常规流程的刚性束缚，进行快速、情境化的反应与创造，这体现了治理体系必要的“适应性能力”[18]。它具体表现为在政策原则框架内，对执行策略进行灵活调整，或基于本地知识临时性组合人员与社会关系以形成解决方案。而“将就”则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务实主义哲学，即放弃对“最优条件”的等待，转而积极识别并利用一切可及的、看似次优的既有条件来启动和推进治理进程。“即兴”与“将就”共同构成了社区在结构性约束下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创造性治理的微观实践基础，为构建更具韧性与内生动力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底层行为逻辑。

2.3. 社会企业：作为资源拼凑与价值共生的关键载体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联结资源拼凑与价值共生的理想组织形态，被界定为“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混合组织。其本质在于依托社区在地资源并最大化社区参与，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实现社会使命与经济实体的双重属性耦合，达成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19]。在社区治理中，社会企业扮演着“民生经纪人”的关键角色：一方面，它以市场化机制整合与运营资源，追求服务的可持续性与效率；另一方面，其利润主要用于反哺社区，解决养老、托幼、环保等民生痛点，实现社会目标。这使其天然成为拼凑社区内外部离散资源、平衡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核心平台。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支持社会企业初期发展，正是看到了其在形成“规模效应”后能够实现自我造血、减轻财政长期负担的潜力。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 H 社区是如何在多重前因条件驱动下，以社会企业为关键行动者与载体，启动对多维度资源的拼凑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产出直接的服务或产品，更催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价值的共生；价值共生又反过来强化了社区内部的信任、认同与合作，从而最终促成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质性建构。

3. 研究设计与案例背景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成都市 W 区 H 社区作为研究案例，聚焦资源约束情境下老旧社区通过内生资源重构与资源拼凑构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发展机制。案例选取主要基于三方面依据：一是典型性，H 社区为典型资源匮乏型老旧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房屋老旧、环境不佳、空巢老人较多等现实问题，传统治理模式与外部资源难以满足治理需求，资源约束特征突出，具有较强的研究代表性；二是创新性，该社区突破外部资源依赖路径，形成“社会企业 + 社区基金 + 多元共治”的资源拼凑模式，治理实践具有可复制性与示范效应，已在成都市及同类老旧社区中得到借鉴推广；三是数据与方法的严谨性，研究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并结合网络资讯、工作视频、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开展三角验证，保证数据信度与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

3.2. 案例背景：H 社区的资源约束与治理挑战

H 社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辖区面积 0.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2 万人，是成都市 W 区一个典型的老旧城市社区，长期面临多重治理困境。在物理与财政资源方面，社区公共空间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普遍老化，维修基金几近枯竭，有限的社区工作经费仅能维持基本行政运转，难以支撑服务创新或环境改善。人力资源亦呈现结构性短缺：社区工作人员编制紧张，日常陷于繁重的行政事务，缺乏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社区内虽有大量退休居民，其中不乏律师、教师、医生等具有专业能力的“社区精英”，却因缺乏有效参与机制而难以融入公共事务。居民的服务需求则日益复杂多元：一方面，老龄化程度高，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38%，对助餐、助医、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年轻家庭对儿童托管、社区环境美化、文化休闲等服务同样抱有强烈期待。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资

本的碎片化——邻里关系疏离，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缺乏信任纽带，社区归属感薄弱，“搭便车”心理普遍存在，集体行动难以动员。正是在这种“全面缺资源”的现实背景下，H社区的治理转型探索展现出极强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4. H社区资源拼凑建构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分析

4.1. 前因条件：驱动拼凑的四重合力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载体，其生成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结构性条件下，由多元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价值共识与行动协同共同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成都市W区H社区的实践表明，共同体的萌发根植于资源约束、政策支持、需求差异与企业战略四重前因条件的深度交织与动态耦合。这四个维度相互激荡、彼此强化，共同构成共同体启动的初始动力系统，并为其演化奠定物质基础、制度框架、价值导向与内生动能。

4.1.1. 资源约束：倒逼探索内生发展的现实起点

资源约束是共同体生成的现实起点与倒逼机制。作为典型老旧小区，H社区长期面临财政紧张、人力短缺与空间碎片化等困境：行政经费仅能维持基本运转，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服务需求；社区工作者数量不足、专业能力有限，陷入“小马拉大车”的治理困局；物理空间权属不清、利用低效，进一步制约公共服务供给。这种刚性短缺打破了“政府单中心”模式的可行性，迫使社区转向整合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企业的资本技术与居民的在地知识，探索不依赖新增财政的内生发展路径。

4.1.2. 政策支持：建构制度框架的行动指南

政策支持为转型提供了制度合法性与行动指引。成都市近年出台《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城乡社区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倡导“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通过“赋权增能”，政策一方面以“社区规划师”“院落自治委员会”等机制赋予多元主体参与权利，另一方面借助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积分激励等工具引导社会力量有序介入。在政策赋能下，H社区孵化出5家本土社会组织，并引入3家企业参与微更新项目，构建起支撑资源拼凑与共同体建设的制度通道。

4.1.3. 需求差异：塑造多元协同的价值纽带

需求差异构成协同治理的价值纽带与实践动因。H社区人口结构多元，老龄化突出，同时聚集大量年轻家庭与流动人口，服务需求高度异质：老年人亟需助餐助医，儿童家庭关注托育教育，商户重视营商环境，新市民则期待公共文化空间。这种碎片化、分层化的需求格局，使单一主体难以全面回应，客观上要求跨部门协作实现精准供给。在回应差异需求的过程中，多元主体逐步凝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共识，将治理行动聚焦于“满足居民真实需求”这一共同目标，为共同体提供深层价值黏合。

4.1.4. 企业战略：注入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企业战略的社区化转向则注入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驻区企业不再仅作为市场参与者，而是主动将社区治理纳入发展战略：物业公司借“红色物业”提升品牌形象，超市通过便民服务站嵌入社区生活，文化企业依托社区文化节融合品牌传播与公共文化培育。这一转向本质上是对“治理红利”的理性把握——既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又可通过公益服务增强居民认同、提升市场竞争力。企业的战略性参与不仅带来资金、技术与人才，更以其网络效应拓展共同体的社会影响力与资源整合能力。

4.2. 拼凑过程：不同资源的重新整合

在资源约束、政策支持、需求差异与企业战略四重前因条件推动下，H社区党委牵头成立全市首家社区居委会全资持股的H社区服务有限公司，以该社会企业为枢纽，社区系统性开展资源拼凑实践，整

合零散闲置资源、赋予其新功能，构建内生可持续的治理生态。

人力资源方面，社区通过化整为零与即兴重组，激活在地人力资本。社会企业组织社区退休党员、热心居民及退休教师、水电维修工等专业个体，经简单培训转化为养老顾问、志愿者、便民维修队员，打破单向服务关系，实现人力资源价值的即兴再创造。市场资源层面，采取无中生有与将就利用策略，挖掘潜在商业机会。针对居民助餐、托管等需求，社会企业整合推出集中配餐、课后照看等微利服务，实现低成本运营；同时改造废弃自行车棚为共享客厅、便民洗衣房，以低价服务回应民生痛点，催生出社区微型市场。制度与政策资源通过循环增殖机制放大效能。社会企业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项目获取初始资金，更将市场化运营利润注入社区公益基金，用于微更新、困难救助及志愿者激励，形成“外部输入-市场转化-内部循环-善治输出”的良性闭环，实现良币驱动社区善治。文化与社会资源聚焦意义激活，依托社区集体记忆、邻里传统及居民美好向往，通过美食节、阳台花园竞赛等活动，将情感认同转化为公共事务参与动力，引导居民将环境不满、邻里怀旧等情感，转化为微更新、共建共享的集体实践，重塑社区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空间资源推行功能重置与复合利用，通过协商将边角地改为共享花园，闲置楼道、物业用房活化为阅读角、议事空间，联动辖区小学开放非教学时段的教室、操场作为亲子活动中心，打破产权与用途壁垒，提升存量空间使用效率，为老旧社区空间再生提供范式。

4.3. 拼凑结果：价值共生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性构建

资源拼凑的直接产出虽为具体服务项目，其深层意义在于促成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多重价值的融合共生。政治价值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经济价值通过社会企业实现社区自我造血，社会价值在精准服务中再生产信任网络，文化价值则重塑公共精神与共同体认同。三者相互支撑，构建“信任-参与-规则-认同”的螺旋强化循环，稳固“社会企业+社区基金+多元共治”模式。更为关键的是，价值共生不仅是治理成果的静态呈现，更是驱动系统自我强化的核心反馈机制。

4.3.1. 认同深化：从价值感知到理性嵌入

为化解共同体认同抽象性与居民参与功利性的张力，价值共生通过结构性机制，将抽象的多元价值转化为居民可感知、可追踪的“价值激励流”，重塑认同的生成基础。社区基金年度公示会是关键制度平台，其核心功能在于将“共建共享”的治理话语，变为居民可直观理解、甚至可进行个体效用核算的具体叙事。一位积极参与社区商业的居民在访谈中说：“以前的动员总是讲‘大局’、讲‘奉献’，感觉与个人生活有距离。而现在，在年度公示会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区便民超市10%的利润如何转化为助老餐的补贴额度，社区咖啡馆的盈利又如何支撑了儿童游乐设施的季度维护。这使得‘共同体’从一个情感概念，变成了一个与我个人的消费选择、社区福利直接挂钩的‘价值账户’。支持社区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出于情感或义务，更成为一种基于长期收益预期的理性选择。”

4.3.2. 制度再生产：从实践规则到治理模板

价值共生在催生有效实践的同时，也推动实践固化为稳定制度，其再生产路径体现为“内部规则正式化”与“外部模式标准化”。针对非正式规则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社区将运行良好、价值显著的临时性约定，升级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地方性公约。“公共空间认养规则”便是典型，其源于居民自发倡议，因改善环境、促进邻里交往获得广泛认同，经社区党组织引导、议事会协商，最终修订为《H社区公共空间自治公约》。社区议事会主任解释道：“规则的权威不是来自条文本身，而是来自它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大家亲眼看到了认养后花园变美、邻里关系变暖，所以才会共同要求把这个好做法‘立下来’，并推广到垃圾分类督导、楼道微更新等其他公共事务中。”

更进一步，价值共生的良性循环逻辑，因其可观测的系统性效果，超越单一社区局限，开启外部模

式标准化扩散路径。H 社区形成的“社会企业盈利 - 社区基金蓄池 - 公益项目孵化 - 志愿骨干培育 - 反哺治理”闭环, 清晰展现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治理效能的可持续转化逻辑, 被上级政府总结为可复制的“H 模式”。其扩散动力并非行政指令, 而是自身治理效能。一位区级治理创新部门负责人指出: “我们推广‘H 模式’的过程, 其他社区的参观者不仅能听到机制讲解, 更能直接观察到社区基金的良性滚动、公共空间的活化利用、居民在议事中展现的主动性与能力。”这种由价值共生本身所证实的有效性, 构成了模式跨区域传播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与内在动力。

面对资源碎片化、认同度低等困境, H 社区借助价值共生, 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激励流”, 形成“情感 - 理性认同深化”与“规则 - 模式制度再生产”的双轮驱动机制。这一机制实现了从资源重构到价值创造的跃迁, 推动社区治理从外部输血转向内生演进, 最终建构出韧性、自主且充满活力的治理共同体。

5.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将资源拼凑理论从创业领域引入基层治理, 拓展了其在公共价值创造中的解释力。传统拼凑多聚焦物质资源, 而 H 社区的实践表明, 在社区场域中, 人力、市场、制度、文化与空间五类资源均可成为拼凑对象, 尤其制度规则、邻里关系、集体记忆等非物质资源, 往往蕴藏着巨大的治理潜能。更重要的是, 社区拼凑的目标并非经济利润, 而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的融合共生, 这为理解非营利性场景下的创新行动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

H 社区的经验为资源紧张的老旧社区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启示。首先, 治理者需转变观念, 从“缺资源”转向“找资源”, 主动识别社区中被忽视的“手头资源”, 相信创造性组合的力量。其次, 应以社区社会企业为关键载体, 它既能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自我造血, 又能坚守社会使命, 是资源整合与价值转化的理想平台。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孵化支持等方式为其创造制度空间。同时必须坚持党建引领与价值引领, 确保拼凑方向不偏离公共利益, 并通过议事协商、活动共创和成果共享, 不断培育共同体认同。

研究表明, 在资源约束、政策支持、需求分化与组织战略四重条件的推动下, H 社区以社会企业为支点, 系统开展五维资源拼凑, 虽产出具体的服务, 却更重要地催生了一个多维价值相互强化的共生体。该共生体赋予社区治理以韧性、活力与可持续性。尽管 H 社区的“社会企业+社区基金”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其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利益分配、合法性边界与执行落地等多方面的挑战。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不是简单的组织叠加或制度移植, 而是一个通过持续创造性实践, 不断生产共享价值、凝聚共识、重塑关系的动态过程。它指向一条内生性、赋能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通过激活主体能动性, 转变“资源洼地”为“价值高地”, 实现从被动治理对象到主动治理主体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 [1] 郁建兴.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 公共管理评论, 2019, 1(3): 59-65.
- [2] 张磊.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及其构建可行性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19(8): 39-50.
- [3] 陈秀红.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6): 83-89.
- [4] 曹海军, 鲍操.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理论探讨, 2020(1): 12-18.
- [5] 张艳, 曹海林.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J]. 中州学刊, 2021(11): 64-69.
- [6] 李沫. 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建构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J]. 学习与探索, 2023(9): 42-49.
- [7] 陈毅, 阚淑锦.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三种类型的分析及其优化——基于上海市的调查[J]. 探索, 2019(6): 110-119.
- [8] 何得桂, 王怡涵. 缔造型积极治理: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逻辑——以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为例[J]. 学习与实践, 2024(5): 43-55.

- [9] 许文文, 石焯. 利益耦合、共同行动与情感共鸣: 社会组织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阶路径[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4, 13(1): 68-84.
- [10] 颜昌武, 杨怡宁. 空间生产视角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营造——以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为透镜[J]. 理论与改革, 2024(1): 126-138, 166-167.
- [11] 陆汉文, 袁霞. 发展的阶梯: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迭代型构[J]. 江淮论坛, 2026(1): 58-66.
- [12] 许文文, 张牧辛.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差异研究——以北京市三个社区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 21(2): 77-90, 173.
- [13] Baker, T. and Nelson, R.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 329-366. <https://doi.org/10.2189/asqu.2005.50.3.329>
- [14] 胡燕, 廖冲绪.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整合能力与协同机制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 21(1): 102-112.
- [15] 李滨, 韩静. 资源整合与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基于多案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5): 89-101.
- [16] 郝文强, 唐亚林. 平台赋能与网络协同: 城市治理数字化场景价值共创的过程与机制——基于 S 市 A 区的案例研究[J]. 电子政务, 2026(1): 54-67.
- [17] 黄艳, 陶秋燕, 高腾飞. 资源拼凑: 起源、研究脉络与理论框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3): 151-160.
- [18] 徐国冲, 宋知远. “拼凑式合作”: 资源约束下基层治理的“权宜之计”? [J]. 公共行政评论, 2024, 17(5): 65-82, 197-198.
- [19] 原珂, 卫萌萌. 社区社会企业及其发展: 基于 S 省 C 市的考察[J]. 行政管理改革, 2025, 10(10): 78-87.